

脸上挂彩、车子被砸仍然“痴心不改”

这个“老娘舅”坚持公益调解30年，“大石头”是他的代名词

在鄞州区东柳街道太古城社区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“老娘舅”——陈武昌。今年刚迈入花甲之年的他，已经做了整整30年的公益调解，11年前就成立了全市首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个人调解工作室。

这5年，陈武昌早就不住太古城社区了，但每天他都会回到调解室。“只要社区需要我，邻里不嫌弃我，我会一直干下去！”



“老娘舅”陈武昌(左)在工作室做调解工作。

A “有烦恼找‘大石头’”

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陈武昌，是宁波较早一批赶上市场经济浪潮下海经商的。从五金家电到食品行业，从运输服务到房产中介，陈武昌做过很多行当。

“那时候，我担任原江东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，经常参与调解一些买卖纠纷，处理各类售后问题。我坚持公平公正，大家都愿意听我几句。”算起来，陈武昌的调解生涯是从1992年开始的，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。

空闲时间，陈武昌自学法律和心理，调解工作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。2010年，宁波

市司法局和宁波电视台合办一档调解类节目——《娘舅大石头》，栏目组慕名找到陈武昌，这一做就是十几年。

这个“老娘舅”一点都不好当。调解时，碰到双方大打出手，“老娘舅”总免不了脸上要挂彩。有一次，瓦片直接从头顶飞过，同行的摄影师被打，车子被砸。但这些都让他打退堂鼓。

随着《娘舅大石头》的热播，陈武昌的名气越来越响，“大石头”早就成了他的代名词，“有烦恼找‘大石头’”更是深入人心。

十几年前，北仑一名妇女慕名找上门，希望“老娘舅”帮她劝劝公公。因为交通事故逃逸，她老公正在服刑，公公从武汉老家赶到北仑。因为家里没有收入来源，老人准备把原先自己模具厂的机器当废铁卖了，这让她很心疼。

“‘老娘舅’，如果机器都卖掉了，等老公出来，我们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。能不能劝劝老人先回家去，这个家我一定会撑起来的！”听了她的一番话，陈武昌被打动了。他反复劝说老人，还给他留下车费。临走时，老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

B 调解要“一气呵成”

翻开陈武昌的工作日志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调解的各类案件。小到邻里纠纷、夫妻矛盾、家产纷争，大到群体性纠纷……这些年，他经手调解处理的各类矛盾纠纷多达数千起。2011年3月，“陈武昌调解工作室”正式成立，这是全市首个以普通居民名字命名的个人调解工作室。

“医生看病，看的是身体上的疾病，而调解工作，很多时候

看的是心病，要抽丝剥茧找到突破口。”说起自己的调解经验，陈武昌这样打比方。

当“老娘舅”这些年，陈武昌坚持调解要“一气呵成”。有时候一天辗转跑4个地方，等回到宁波已是深夜，他却连一顿饭都没吃上，差点晕倒在调解现场。“调解一旦中断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不管有多累、多饿，必须坚持到底！”

做调解要“三勤”——脚勤、手勤和嘴勤，这是陈武昌的调解心得。前几年，宁波一社区发生扰民现象，居民集体上访。为了深入调查，陈武昌连续几天凌晨赶到现场查看，做记录，挨家挨户走访了30多户居民。拿到第一手资料后，他再和涉事单位沟通。用了3天时间，这个困扰居民好几年的扰民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。

C 不住在社区了仍每天来“报到”

从第一次担任太古城社区业委会主任开始，陈武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，至今已有20多年。“每次换届重新选举业委会主任，大家都希望我能继续担任，我不能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。”让人感动的是，从2017年开始，陈武昌帮儿子带孙子，早就不住在社区了，但每天他照常来社区“报到”，调解基层矛盾。

太古城小区是一个老小区，建成已有20多年。前些年小区里很多椅子都已经破损。“每次

路过社区小公园，我看很多居民都没地方坐。”陈武昌看在眼里，便自掏腰包在公园安装了十多把玻璃钢制成的桌椅。这样的闲事，陈武昌经常管。有独居老人生病了，他带老人看病就医、代缴医药费；小区的公共设施坏了，他自己动手维修。

这些年，社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，有老人向他抱怨，平时出门理发不方便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陈武昌利用空闲时间，走访社区周边理发店，邀请店主一起做公益。2015

年，一支银发义剪志愿队伍成立了。每月月初，他们都会出现在太古城社区，专为社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理发，至今已有7年了。

今年，社区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，陈武昌更是闲不住，主动倾听居民的心声。“大家有什么需求都愿意和我说，我再积极和社区沟通。希望趁着老旧小区改造，把我们这个小区好好改造一番。”

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
通讯员 陆婧楠 文/摄

方寸之地看变迁

老人捐出收藏多年的景区门票和明信片

近日，家住江北区的市民董旦旦打进本报热线，他表示，看到宁波晚报上报道的国家版本馆的中华版本资源征集活动，自己有意捐赠近千张全国各地的景区门票以及几百张明信片。这些都是他收藏十余年的宝贝。

他是如何收集到这么多的门票和明信片的呢？这要从他的爱好说起。

董旦旦出生于1949年，认识他的人都知他特别爱读书。董先生说，虽然自己退休前是一名工人，并不是做文职工作的，但从年轻时开始，业余时间总会抱着书不放。从历史军事、人物传记到小说杂文，几乎什么类型的书他都看。

记者在董先生家里看到，他家书房一整面墙都做成了书柜，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。许多书籍已经泛黄，年代感扑面而来。董先生告诉记者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许多旧书被打包起来，放在车棚里。

2004年，原本在外地工作的董先生退休回到宁波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看书上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董先生总是在路边的旧书摊、废品收购站流连，淘旧书成了他退休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“我看这些淘来的旧书时发现，很多人喜欢把旅游门票夹在书里当作书签用。我就把这些门票另外放置。”董先生说。慢慢地，这些门票越攒越多，于是，自己干脆就将它们分门别类，并收集成册。

董先生拿出六七本厚厚的文件夹，包括浙江、江苏及上海、川渝地区，还有北京和东北一些城市旅游景点的门票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董先生的收藏册中，最早的一张门票是1965年9月5日的。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景区门票价格普遍只有几毛甚至几分钱。那时候经济条件有限，门票很朴素，上面只有字，没有什么图案。”董先生说，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门票的图案就开始慢慢变得精美，颜色也丰富了。”

董先生给记者对比了宁波天童禅寺的两张门票。年代最早的一张不过普通粮票大小，票面是一幅水墨画。在黄底的映衬下，整张门票像一张古代的卷轴；后来改用了彩色的风景照，尺寸也略微放大。

除了近千张门票外，董先生还收集了几百张明信片。从中同样可以看到，印制图案从简单的线条、单一的色彩，逐渐变得清晰、精致，更具设计与美感。而明信片上的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口语化、生活化。

“我收藏的这些东西，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，但是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，我们的生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，也希望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”董先生说。 记者 陶倪 文/摄



董旦旦老人和他收藏的景区门票。